申丹　主编
新叙事理论译丛：跨学科叙事理论

新叙事学

〔美〕戴卫·赫尔曼　主编
马海良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　京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01-447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叙事学/(美)赫尔曼主编;马海良译.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5

(未名译库 新叙事理论译丛/申丹主编)

ISBN 7-301-05450-5

Ⅰ. 新… Ⅱ. ①赫…②马… Ⅲ. 叙述 - 创作理论 Ⅳ. I0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3199 号

Narratologies

Edited by David Herman

© 1999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书 名:新叙事学

著作责任者:〔美〕戴卫·赫尔曼 主编 马海良 译

责任编辑:王立刚

标准书号:ISBN 7-301-05450-5/I·0600

出 版 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http://cbs.pku.edu.cn

电 话:发行部 62754140 编辑部 62752036

电子信箱:zb@pup.pku.edu.cn

排 版 者:兴盛达打字服务社 62549189

印 刷 者:北京大学印刷厂

发 行 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890 毫米×1240 毫米 A5 开本 9.625 印张 286 千字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8.00 元

《未名译库》出版前言

百年来，被誉为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与中国的科学教育和学术文化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北大深厚的文化积淀、严谨的学术传统、宽松的治学环境、广泛的国际交往，造就了一代又一代蜚声中外的知名学者、教授。他们坚守学术文化阵地，在各自从事的领域里，写下了一批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上产生深远影响的著作。同样，北大的学者们在翻译外国学术文化方面也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1898 年 6 月，早在京师大学堂筹办时，总理衙门奏拟的《京师大学堂章程》第五节中就明确提出“开设编译局，……局中集中中西通才，专司纂译”。1902 年 1 月，光绪发出上谕，将成立于 1862 年，原隶属于外务部的同文馆，归并大学堂。同年 4 月，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张百熙奏请光绪，“推荐精通西文，中学尤有根底”的直隶候补道严复，充任译书局总办，同时又委任林纾为译书局笔述。也在这一年，京师大学堂成立了编书处，任命李希圣为编书处总纂。译书局、编书处的成立和同文馆的并入，是北京大学全面翻译外国图书和从事出版活动的开始，也是中国大学出版活动的开始。1902 年，是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创设之年。

辛亥革命以前，京师大学堂就翻译和出版过不少外国的教科书和西学方面的图书。这批图书，成为当时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重要参考书。从严复到蔡元培、蒋梦麟、胡适等校长执掌北大期间，北大更是以空前的热忱翻译了大量的外国作品。二三十年代，当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名著丛书”及“万有文库”中的许多译者来自北大。一百年来，在北大任教过的严复、林纾、鲁迅、周作人、杨昌济、林语堂、梁实秋、梁宗岱、朱光潜、冯至、曹靖华、金克木、马坚、贺麟、洪谦、宗白华、周一良、齐思和、唐钺、刘振瀛、赵梦蒸、杨周翰、郭麟阁、闻家驷、罗大冈、田德望、吴达元、高名凯、王力、袁家骅、岑麒祥等

老一辈学者，以及仍在北大任教的季羡林、杨业治、魏荒弩、周辅成、许渊冲、颜保、张世英、仲跻昆、刘安武、桂裕芳、蔡鸿滨、厉以宁、朱龙华、张玉书、范大灿、王式仁、陶洁、顾蕴璞、罗芃、赵振江、赵德明、杜小真、申丹等老中青三代学者，在文学、哲学、历史、语言、心理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领域里，以扎实的外语功力、丰厚的学识、精彩的文笔译介出了一部又一部外国学术文化名著，许多译作已成为传世经典。在他们的译作中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振兴中华民族的责任和对科学文化的关怀，为我们民族不断地了解和吸收外国的先进文化架起了一座又一座的桥梁。

值此北大出版社建立100周年之际，我社决定推出大型丛书“未名译库”(Weiming Translation Library)。“译库”为综合性文库。文库以学科门类系列及译丛两种形式出版。学科门类系列包括：哲学与宗教系列、文学与艺术系列、语言与文字系列、历史与考古系列、社会学与人类学系列、传播与文化系列、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系列、经济与管理系列等；译丛为主题性质的译作，较为灵活，推出的有“经济伦理学译丛”、“新叙事理论译丛”、“心理学译丛”等等。“未名译库”为开放性文库。未名湖是北大秀丽风光的一个象征，同时也代表了北大“包容百川”的宽广胸襟。本丛书取名为“未名译库”，旨在继承北大五四以来“兼容并包”的学术文化传统。我们将在译库书目的选择(从古典到当下)和译者的遴选上(不分校内校外)体现这样一种传统。我们确信，只有将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我们的头脑，才能够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社会。我们将长期坚持引进外国先进文化成果，组织翻译出版，为广大人民服务，为我国现代化的建设服务。

由于我们缺乏经验，在图书的选目与翻译上存在不少疏漏，希望海内外读书界、翻译界提出批评建议，使“未名译库”真正能成为一座新世纪的“学术文化图书馆”。

《未名译库》编委会

2002年3月

目　录

总序 …… 申丹（1）
引言　新叙事学 …… 戴卫·赫尔曼（1）

第一部分　经典的问题，后经典的方法

第一章　似知未知：叙事里的信息延宕和压制的
认识论效果 …… 爱玛·卡法勒诺斯（3）
第二章　威茅斯经验：同故事叙述、不可靠性、伦理与
《人约黄昏时》 … 詹姆斯·费伦、玛丽·帕特里夏·玛汀（35）

第二部分　新技术与新兴的方法论

第三章　电脑时代的叙事学：计算机、隐喻和叙事
…… 玛丽-劳勒·莱恩（61）
第四章　过去之事，现在之事，将来之事：时态、
体式、情态和文学叙事的性质 …… 乌里·玛戈琳（89）
第五章　“说话，朋友，进来吧”：花园路、人工智能
和认知叙事学 …… 曼福雷德·雅恩（114）

第三部分　走出文学叙事

第六章　社会叙事学：分析自然语言叙事的新方法
…… 戴卫·赫尔曼（147）
第七章　虚构叙事与历史叙事：迎接后现代主义的挑战
…… 卢波米尔·道勒齐尔（177）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四部分　叙事媒介,叙事逻辑

第八章　用声音叙述的电影的新动向 …… 西摩·查特曼 (205)
第九章　歉疚的追求:女性主义叙事学对文化研究的贡献
…… 罗宾·R.沃霍尔 (231)

参考文献…… (247)

总　序

“新叙事理论”指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的后经典或后现代叙事理论。最近十多年，国内翻译出版的都是西方学者著于20世纪70至80年代的经典叙事理论，迄今为止，尚未涉足“新叙事理论”这一范畴。本译丛旨在帮助填补这一空白。

1999年秋美国俄亥俄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新叙事理论的代表作 *Narratologies*，该书主编戴卫·赫尔曼采用了“叙事学的小规模复兴”这一短语，来描述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文学界，尤其是美国文学界对叙事理论研究兴趣的回归。但这绝不是简单的回归循环，而是对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反思、创新和超越。

结构主义叙事学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产生于结构主义发展势头强劲的法国，但很快就扩展到了其他国家，成了一股国际性的文学研究潮流。与传统小说批评形成对照，结构主义叙事学将注意力从文本的外部转向文本的内部，注重科学性和系统性，着力探讨叙事作品内部的结构规律和各种要素之间的关联。众多叙事学家的研究成果深化了对小说的结构形态、运作规律、表达方式或审美特征的认识，提高了欣赏和评论小说艺术的水平。诚然，作为以文本为中心的形式主义批评派别，叙事学也有其局限性，尤其是它在不同程度上隔断了作品与社会、历史、文化环境的关联。这种狭隘的批评立场无疑是不可取的，但其研究叙事作品的建构规律、形式技巧的模式和方法却大有值得借鉴之处。令人遗憾的是，西方批评界往往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不少研究小说的西方学者将注意力完全转向了意识形态研究，转向了文本外的社会历史环境，将作品视为一种政治现象，将文学批评视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他们反对小说的形式研究或审美研究，认为这样的研究是为维护和加强统治意识服务的。在这种“激进”的氛围下，叙事学研究受到了强

烈的冲击。

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了一味进行政治批评和文化批评的局限性,这种完全忽略作品艺术规律和特征的做法必将给文学研究带来灾难性后果。他们开始再度重视对叙事形式和结构的研究,认为小说的形式审美研究和小说与社会历史环境之关系的研究不应当互相排斥,而应当互为补充,从而出现了对叙事理论研究兴趣的回归。近年来叙事理论研究的复兴,有以下三个特点:其一,目前叙事学家们在分析文本时,一般较为注重读者和社会历史语境的作用。其二,重新审视或者解构经典叙事学的一些理论概念,例如"故事与话语的区分"、"叙事性"、"叙事者的不可靠性"、"隐含作者"、"受述者"等等。其三,注重叙事学的跨学科研究,越来越多的叙事理论家有意识地从其他派别吸取有益的理论概念、批评视角和分析模式,以求扩展研究范畴,克服自身的局限性。

西方叙事理论的"盛—衰—盛"发展史从一个侧面表明,尽管西方每一个时期几乎都有一个占据主导地位的理论流派,但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你方唱罢我登台"的替代史。当今,西方的文学批评理论呈现出一种多元共存的势态。其实,任何一种理论和批评模式都有其合理性和局限性,尤其在关注面上,都有其重点和盲点,各个批评理论派别之间往往呈现一种互为补充的关系。美国的《文体》杂志第34卷第2期(2000年夏季刊)发表了以"叙事概念"为主题的专刊,布赖恩·理查森为该专刊撰写了导论,该文最后的结论是:"叙事理论正在达到一个更为重要、更为复杂和更为全面的层次。由于后结构主义已经开始消退,而一个新的(至少是不同的)批评范式正在努力占据前台,叙事理论很可能会在文学批评研究中处于越来越中心的地位。"但在我们看来,取代并非理想,是否占据中心也并非重要。文学研究的发展呼唤宽容开放和多元互补。希望在新的世纪里,叙事理论在文学研究的百花园里,会更加茁壮地成长,更加绚丽地开放。

中国的文学研究界在经历了多年政治批评之后,改革开放以来,欢迎客观性和科学性,重视形式审美研究,为新批评、文体学、叙事学等各种形式批评学派提供了理想的发展土壤。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美国叙事学研究处于低谷之时,国内的叙事学研究却形

成了一个高潮。一方面国内学者叙事学方面的论著不断问世,另一方面西方叙事学家著于70和80年代的作品也不断以译著的形式在中国出现,其中包括热拉尔·热奈特的《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华莱士·马丁的《当代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施洛米丝·里蒙-凯南的《叙事虚构作品:当代诗学》(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米克·巴尔的《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尤其令人感到欣喜的是,似乎与美国叙事学的复兴遥相呼应,近些年来,在国内出现了以杨义的《中国叙事学》(人民出版社,1997)为代表的本土叙事学研究的热潮,旨在建构既借鉴西方模式,又有中国特色的叙事理论。但迄今为止,国内的研究有一个问题,颇值得引起重视:无论是译著还是与西方叙事学有关的论著,一般都局限于20世纪80年代末以前的西方经典叙事学,忽略了90年代以来西方的"新叙事理论"。诚然,对于后经典或后现代叙事学的研究应当以对经典叙事学的研究为基础。以前,在国内对于经典叙事学尚未达到较好了解和把握的情况下,集中翻译和研究经典叙事学无疑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但从现在开始,应该拓展视野,对近十年来西方新的后经典叙事理论展开翻译和研究。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未名译库:新叙事理论译丛"应运而生了。我们编选的这套译丛首批共五种。第一种为解构主义叙事理论的代表作:J.希利斯·米勒的《解读叙事》(1998);第二种为女性主义叙事理论的代表作:苏珊·S.兰瑟的《虚构的权威》(1992);第三种为修辞性叙事理论的代表作:詹姆斯·费伦的《作为修辞的叙事》(1996);第四种为多种跨学科叙事理论的代表作:戴卫·赫尔曼主编的《新叙事学》(*Narratologies*)(1999);值得一提的是,"Narratology"(叙事学)这一名词一直被视为不可数名词,但这本书的书名却采用了该词的复数形式。这旨在强调书中叙事研究方法的多样性。这些研究方法基本都是将叙事学与其他学科相结合的产物,具有很强的跨学科性质。第五种为后现代叙事理论的代表作:马克·柯里的《后现代叙事理论》(1998)。

可以说,"新叙事理论译丛"集后经典叙事理论之精华,是对我国近二十年来引进的西方经典叙事理论的不可或缺的重要补充。这些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译著代表了新叙事理论的不同研究派别，角度新颖、富有深度，很有特色。为拓展思路、深化研究提供了极好的参照。希望在未来一段时间里，有更多的新叙事理论的译著和论著问世；同时也希望在建构中国叙事学时，能适当借鉴西方后经典或后现代叙事理论。

在这套译丛的编选翻译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北京大学出版社的鼎力相助，尤其感谢张文定副总编和张冰副编审的大力支持。国内外许多学者和朋友给予了热情鼓励和帮助。美国叙事文学研究协会前主席、《叙事》杂志主编詹姆斯·费伦教授直接参与了这套译丛的选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汪民安博士在本译丛的策划过程中，予以了热情支持。北京广播学院周靖波教授拨冗阅读了全部译稿，提出了宝贵意见。学者们认为这套丛书在国内具有填补空白的作用，必将受到读者的欢迎，对国内叙事理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应能起到较强的推进作用。

谨将这套丛书奉献给我国日益增多的叙事理论研究者和爱好者。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不足之处，敬请专家学者不吝指正。

申　丹

2001年秋于燕园

引言　新叙事学

戴卫·赫尔曼

1　关于叙事学的两种叙事

1983年，施洛米丝·里蒙-凯南完成了她那部堪称叙事学和叙事理论指南的很有用（被广为引用）的专著《叙事虚构作品：当代诗学》，书中谈及解构主义对经典叙事学构成的挑战；她希望当时刚刚登上理论舞台的解构主义或许会使叙事理论更加丰富，而不是成为明日黄花。里蒙-凯南显然没有把她那部提纲挈领的介绍性专著看做这个研究领域的终结讣告（130）。大约15年后的今天，里蒙-凯南对叙事学谨慎乐观的预言已经得到验证。似乎可以一言以蔽之：关于叙事学已死的传言实在是夸大其辞了。近年来，我们亲眼看到叙事研究领域里的活动出现了小规模但确凿无疑的爆炸性局面。[①]这场小规模的叙事学复兴的标记是多方面的，譬如发表和出版了一批对经典叙事学的研究模式重新思考和重新语境化的论文、专刊、专著；专门杂志《叙事》（1993年才创刊）取得了明显的成功；从1994年就开始出版系列专著——本书也属于这一系列。叙事理论借鉴了女性主义、巴赫金对话理论、解构主义、读者-反应批评、精神分析学、历史主义、修辞学、电影理论、计算机科学、语篇分析以及（心理）语言学等众多方法论和视角，不仅没有消亡，反而顽强地存活下来，有时甚至会出现自里蒙-凯南的那部专著出版以来最惊人的变形。[②]经过这些年的积极发展，一门“叙事学”（narratology）实际上已经裂变为多家“叙事学”（narratologies），结构主义对故事进行的理论化工作已经演化出众多的叙事分析模式。这些模式与结构主义传统形成批判和反思

的关系,从自己意欲超越的分析传统中承接了颇为丰富的遗产。在某种程度上说,本论文集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厘清当前的叙事研究方法所因袭的谱系,记载近年的叙事理论研究在多大程度上替换和转换了结构主义叙事学的设想、方法以及目的。

因此,《新叙事学》力求超越两种广为流行但互相对抗的关于叙事学的历史和沿革的复杂说法。叙事学作为法国结构主义文学理论的一个分支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按照第一种说法,术语森严且热衷于严格分类法的叙事学是正宗结构主义的科学诉求的根本标志,而那样的时代早已过去。不错,坚持结构主义传统的研究者们提出了一些很有用处的叙事分类方案,而且为描述一个特定叙事的具体效果引入了一套颇为精细的分析语汇。可是随着其他一些文学和文化理论思潮取得日益突出的地位(譬如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等等),当初以叙事的科学自命的叙事学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就落得一个"陈旧过时"的评语。当然,并非所有的人都认为叙事学已经消亡。按照第二种说法,亦即另一种叙述,叙事学处于危机之中。最近的研究突出了经典叙事学未能涉及或有意回避的叙事的话语方面,其结果是,尽管结构主义传统在叙事分析领域(这里仍然工作着一大批出色的学者)取得了可观的成果,但是按照"危机说",我们现在必须看到把叙事学用作进一步研究的范式所面临的问题。例如,女性主义学者们认为,旧的叙事学范畴未必能够把握性别问题在故事的生产和处理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有些研究者把我们对叙事的理解提升为作者、叙述者以及各种受众之间复杂的修辞处理关系。也有的叙事理论家借助于人工智能理论、超文本理论、精神分析学、电影研究以及语言学(包括可然世界语义学和语篇分析)等视角,拓宽和丰富我们对故事范畴的理解,为分析它们的结构和效果提供新的方法。

不难看出,当前叙事研究领域表现出的巨大活力和创新,使过时说和危机说都显得有失偏颇。叙事诗学在过去十多年来发生了惊人的嬗变,到今天似乎完全可以谈叙事学的"复兴"。换言之,叙事学已经从经典的结构主义阶段——相对远离当代文学和语言理论的蓬勃发展的索绪尔阶段——走向后经典的阶段。后经典叙事学(不要将

它与后结构主义的叙事理论相混淆)只是把经典叙事学视为自身的"重要时刻"之一,因为它还吸纳了大量新的方法论和研究假设,打开了审视叙事形式和功能的诸多新视角。其次,后经典阶段的叙事研究不仅揭示结构主义旧模式的局限性,而且也充分利用它们的可能性;正如后经典物理学也不是把牛顿模式简单地抛在一边,而是重新思考它们的潜在思想,重新评估它们的适用范围。[③]

因此可以说,收入《新叙事学》的这些文章展示出一种不同的讲述故事研究这一故事的方式。本论文集将经典叙事学的模式和工具置于新的语境之中,表明不妨把叙事学已经死亡(或陷入危机)的假说看成叙事分析在更多研究领域里的重新出现和转换。从词源上看,"重新出现"(reemergence)是一种从属性的起源,亦即对曾经新生的思维方式予以重新思考。后经典叙事学可能缺乏初生牛犊的那种一往无前的激情、纯粹发现所带来的不可抑止的激动以及20世纪60年代第一次符号学大革命所引起的对方法论的美好幻想,但是它的长处在于对自身范围和目的进行了更有力的反思,更好地意识到周边其他批评理论的发展,采取了一种更为灵活和更具探索性的姿态,在研究叙事(或任何其他对象!)时,更愿意承认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也不应该一蹴而就。我相信《新叙事学》里的文章已经生动地表明了叙事分析正在经历的这种重新调节。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叙事学已经演变为一个更具包容性和开放性的工程,它决不会再像从前那样一味地追求最好的描述和说明模式。因此总的来说,本论文集主要想完成三个目标:(1)检验经典的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可能性和局限性,评估那些模式能够和不能够阐明什么样的叙事现象;(2)必要时用后经典模式丰富经典模式,以此与曾经困惑甚至削弱叙事学研究的叙事话语方面相协调;(3)通过对具体文学或其他叙事作品的阐释来实现目标(1)和(2),以此表明后经典叙事学不仅与文学理论和叙事理论的研究相关,而且与普遍的批评实践相关。的确,正是对诗学和批评的双重强调以及对叙事话语系统的特征和个别叙事的特征的双重关注,[④]使《新叙事学》成为致力于叙事理论与阐释的系列著述中的一种。

下一节将说明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的一些差异。我想集

中讨论一个著名的(而且确实经常被收入各种文集的)以经典概念和方法为基础的叙事分析个案,即戴卫·洛奇的《现实主义文本的分析和阐释》(1996[1980])。这篇文章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它最初是洛奇为1979年夏天泰尔阿维夫大学波特尔诗学与符号学研究所举办的一次名为"提纲2:叙事理论与小说诗学"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米克·巴尔曾经在《叙事学要义》中把那次会议说成是经典叙事理论在诸多方面的一次高水平展示会。洛奇的文章以欧内斯特·海明威的短篇小说《雨中的猫》为关注中心,将理论与阐释相结合,用结构主义的概念进行实际的阐释操作。他的分析表现出娴熟的技巧和很强的启发性,我的学生们在领会和理解结构主义及其叙事理论时,觉得洛奇的分析很有用处。但是洛奇文章的意义也在于它未予关注的问题。我从该论文集的诸位作者所构想的各种叙事学中得到启发,将洛奇的研究方法置于新的语境,并且用结构主义全盛时期之后出现的一些新观念来丰富他的方法。我只对上述论题作一粗略探讨,目的是让读者感觉到叙事学是一个动态演化的领域,而不是一种充其量只有一定用处而且已经过时的分类学研究。

2 "……一种更丰富、更有用、更完整的叙事学"[5]

洛奇文章的目的之一是清点1970年代后期的一些叙事分析模式;他将那些模式分为三类:依靠"叙事学和叙事语法"建立的模式,与"小说诗学"相联系的模式,用于故事的"修辞性分析"的模式;我将在后面详细讨论这些模式。然而,洛奇的文章不只是对当时叙事学家所用最新理论工具的综述,贯穿于文章的问题之一是:"把现代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全套工具用于一个文本,是否可能,是否有用?这样做会得到什么?"(24)。洛奇把《雨中的猫》用作他的示范文本,极力说明,将叙事理论与叙事阐释综合起来,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有益的。他认为海明威的小说《雨中的猫》具有特殊的地位:一方面,这篇小说似乎假定了文本与现实之间的逼真关系,这"在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经典现实主义的继续";但是另一方面,许多读者发现这个叙

事是“多价的，歧义的，抵制终极阐释”的(29)。小说讲述一对无名氏美国夫妻在意大利投宿的故事，从表面上看，它只是突出描写了单单几个可报道的事件：在满腹心事的丈夫读书时，妻子大着胆跑到下雨的外面，(颇费周折地)去找一只猫，她不想让猫露宿淋雨；这似乎隐约象征着妻子渴求她眼下缺乏的东西。故事由一个异故事叙述者讲述，叙述过程中的聚焦方式由外向内，后来证明这种方式具有关键的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洛奇在分析海明威的小说时，有力地展示了结构主义经典理论的用处。例如，“结构主义者把语言看做一个差异系统，把意义看做结构对立的产物”(35)，他以此反对约翰·V.哈格皮安把小说里穿着橡胶斗篷的那个男人读解为避孕的象征。避雨的形象可以是试图阻挡生殖的力量，但是洛奇认为，海明威使用的是一种不同的对照系统，该系统将雨与烦闷而不是与生殖相联系。洛奇还进一步充分利用了热奈特的频率思想，即故事世界里某事发生的次数与叙事中讲述此事的次数之间的关系。他发现海明威“倾向于反复讲述故事，而不是概括故事；发生 n 次的事情，讲述 n 次；发生一次的事情，也讲述 n 次；但是不会对发生 n 次的事情讲述一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因为它用极为有限的动作加强了对人物形象的说明”(33)。因此故事的形式包含着翻来覆去而令人倦怠的意味，这也正是小说的基本主题之一。不过，洛奇文章中最有启发的部分也许是他对聚焦的微妙转换所作的解说，它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雨中的猫》直到结尾仍然存在着歧义。洛奇还运用了热奈特对“说”(叙述)与“看”(聚焦)的区分。海明威小说的故事是由一个准全知的异故事叙述者讲述的，而故事的聚焦却是可变的，视角从那对夫妻的外部移到内部的丈夫一方或妻子一方。洛奇熟练地显示了这些聚焦转换如何通过故事的词语机质发生作用，具体地说，就是通过定冠词与不定冠词之间的对照发生作用：

> 现在我们可以充分理解小说结尾的意义为何如此含混：主要因为这个关键时刻的叙述采用了丈夫的视角。由于他躺在床上，没有站起来看一下窗外避雨的猫，所以他无从知道那只猫是否

> 就是女佣带来的那只猫;于是这里用了一个不确定的不定冠词:"一只青灰色的大猫"。然而,如果这时采用妻子的视角,文本读作……"她抱着一只青灰色的大猫",那么很显然,这只猫就不是妻子想从雨中找回来的那只猫(在这种情况下,会用到定冠词)。意味深长的是,小说标题里的"猫"前面没有用定冠词,这就使关于小说结尾的两种阐释都没有得到明确的支持。(34)

洛奇确实富有成效地应用了结构主义的理论,他的论文展示了频率和聚焦等概念所能产生的阐释效果。

然而,在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全盛时期之后产生的分析工具有助于对海明威的小说提出洛奇未能讨论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之所以未能提出,并不是因为洛奇本人的疏忽或无知。应该说,在经典视角的范围之内是不可能提出这类问题的。我们面对的不是这个或那个批评家的失败的问题,而是研究工作所受到的一般限制,即叙事研究的可能性条件。因此我的目的不是解决叙事学内部孰优孰劣的问题,而是显示后经典方法如何丰富了洛奇所作的那一类阐释。

其实洛奇本人说得很清楚,应该将叙事理论置于叙事历史的实际状况当中,梳理讲故事的技巧和用以研究这些技巧的策略的演变过程。洛奇指出,在先锋派小说家的自觉实验与语言学、民俗学以及人类学的发展——这些发展的结果是产生了我所谓叙事分析的经典模式——之间存在着相互配合的历史关系。现实主义小说的典型特征是将自己的再现程式隐藏起来,把自身的建构性放在背景位置,转换成一扇面对世界的透明窗户,试图创造一种身临其境的体验。与此相对照,实验小说则突出自身的叙事结构和作为被建构的故事的地位。这种自觉的小说显然需要叙事分析的工具。当代的创作实践破除了对故事的直接感性体验,把注意的焦点置于读者将某些话语方式阐释为叙事时所依据的各种程式,使叙事结构分析之细密详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不过,正如洛奇所说:

> 长期以来,小说研究与理论探讨两条路一直是分多合少。然而最近数十年间,本质上以经验和文本为基础,批评成就斐然但理

论力量较弱的英美形式主义批评撞上了比较系统、抽象、理论严谨、追求"科学性"的欧陆结构主义批评。其结果便是叙事理论和小说诗学领域里发生了一次小规模的"知识爆炸"。(24)

在洛奇所描述的三个不同的探讨领域里,可以明显感觉到这第一次叙事学知识爆炸的冲击波。三个领域分别探讨叙事结构的三个不同层面。首先是弗拉基米尔·普洛普、克劳德·布雷蒙、阿尔热达-于连·格雷马斯、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茨维坦·托多洛夫以及罗兰·巴尔特等人从事的叙事学和叙事语法或叙事语言(langue)的研究。用洛奇式的术语来说,这第一个研究领域的焦点是叙述内容或故事的组织情况,即"故事"(fabula)在"情节"(sjuzhet)中的各种实现方式所依托的结构。[6]第二是小说诗学或"所有试图对小说再现技巧予以描述和分类的努力"(26);在洛奇看来,韦恩·布斯和热拉尔·热奈特的著述都属于这个题目范围。这类研究的对象是被叙述世界与叙事或故事与话语或"故事"与"情节"之间的关系,譬如叙述者讲述故事事件时的顺序。第三是小说的修辞性分析,"我用这个术语指对叙事文本的表层结构的分析,它显示故事的语言媒介如何决定故事的意义和效果"(27)。按照洛奇的说法,修辞性分析法不仅从罗曼·雅各布森(1971)对隐喻与换喻的区分(以及换喻与现实主义的联系)中得到动力,而且与英美新批评也有重要的联系。这第三种方法以话语层面的叙事特征为研究对象。不过应该看到,洛奇对这一方法的描述并没有将修辞性分析与小说诗学截然分开。而且正如本论文集中詹姆斯·费伦和玛丽·帕特里夏·玛汀的文章所阐明的那样,洛奇将修辞性分析与对故事里所用的比喻或修辞格进行的研究等同起来,限制了修辞性分析的力量,这一点我将在下文中讨论。修辞性分析的范围可以更开阔一些,因而可以更有成效一些,不妨把它看做对叙事形式与叙事受众的研究。

实际上,叙事学研究领域的整个格局与近20年前洛奇着手探究时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这是由于叙事学知识的第二次爆炸正在冲击着当前的各个研究领域。洛奇提出的三个主要的考察任务——叙事语法的梳理,叙事诗学的创建,故事修辞学的发展——已经进入并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